



香港天主教會與一九九七

——從回顧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說起

張家興

(本文是作者於一九八七年六月向香港教區國籍神職人員及修女所發表的演講。)

教宗保祿六世在梵二開會期間曾向巴西主教們說：「你們生活在發展極度迅速的社會中……你們用的牧民方法一定要與社會轉變保持實質關係。」

保祿六世的說話對我們香港教會有非常適切的時代意義。香港社會在過去數十年內發生了急遽的改變。而在這幾年內，香港天主教會亦以不同方式回應了不同時代的挑戰。今天，我們社會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是要在由英國殖民地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過渡期中，如何突破過去建立的框框適應和參與設計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為教會來說，她的挑戰是要檢討過去數十年逐步走出來的道路及發展起來的規劃，突破其局限，自由地接受新時期的挑戰，迎向未來。

我今天的講話就是將香港社會過去數十年不同階段的發展及教會的不同回應簡單地勾劃出來，然後較具體地討論一九九七為教會帶來的挑戰。

(一)難民時期 (四〇年代後期至五〇年代初期)

在1941年，香港人口為164萬。1945年，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前，人口劇跌至60萬。和平後，人口陸續增加。至1949年，國內的政治變化帶來了本港人口結構的急變。1951年，香港人口已增加至200萬。數年間，難民蜂湧而至。到1956年，人口已跳升至261萬，比戰前人口多出了超過六成。

這時，香港政府前程未卜，在借來的地方採用的是「無為而治」的統治方法，完全沒有長遠的發展方案。當時的難民亦不作長久居留香港的打算。他們期待國民黨一日成功反攻大陸，他們亦可以重返舊日家園。

這個時期的社會，根本沒有足夠裝備去應付在短時間內劇增的人口。這時最急切要解決的是生存的問題。一切房屋、醫療、教育設施，雖然簡陋到無可再簡，也難以安頓數十萬計的難民。政府顯然並沒有提供大規模的相應服務。而志願團體，包括教會團體，就作出了最積極的反應，全面投入了救濟難民的工作。

這時期經濟生活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低潮。作為轉口商埠，香港的轉口貨品，在相當長時間內，佔貿易總額的九成。1950年，韓戰爆發，很多西方國家實施了對中國的禁運。1952年的香港貿易總額跌至500萬，僅為上年的三份之一。同年的失業率高達34%。市民生活陷入極度困苦之中。

在文化領域中，人們強調的是自由，主要是免受共黨統治的自由。作為中國人，要離鄉別井，幾經艱苦，在英國殖民地統治者庇蔭下，尋找一塊安樂土，亦可算訴盡這一代難民的辛酸。

當時的本地政治生活亦很貧乏。公眾參與政治事務簡直絕無僅有。唯一最明顯的政治角力仍然是國共之爭。而這其實是大陸政治的伸延。1950年代發生於石硤尾的暴動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牧民回應

有些神職人員及會士、修女，包括傳教士，亦陸續隨着難民一起逃到香港。其中有些部份在大陸的農村及小鎮傳教，因而除了帶



來對共產黨的恐懼和憎恨之外，亦帶來了農村傳教的方式。有些國家觀念較重的神職人員却不願留在這塊殖民土地上，毅然到台灣去了。

天主教會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確實吃過不少苦頭。因而50年代香港天主教會得到反共的西方政府及教會的援助，而在救援難民工作上成為他們的主要伙伴，並不是偶然的。

愛德工作，表現在救濟難民的工作中，是這時期教會工作的重點。聖雲仙會，可算是當時教會內最龐大、最具影響力的善會之一。他們積極投入協助組織，派發食品、衣服及毛毯等工作。

同一時期，教友人數的上升表面上令人鼓舞，但因他們只得到最起碼的教理培育，這一代的基督信仰根基不深。若未能在日後得到再培育的機會，恐怕難以經得起現代生活的考驗。

這時，教會的主要幹部是傳教士及修會會士。國籍及本教區神職人員寥寥可數。

(二)經濟發展時期 (五〇至六〇年代)

到了50年代中後期，人們開始看到中國大陸政局已定，推翻中共政權的機會渺茫，因而回到舊日家園的機會亦愈趨渺茫。人們開始收拾失落的情懷，專心在港建設新的家園。很多人則決定到台灣去。

經濟建設於是成爲這時期的社會目標。上海廠家帶來了工業經營的經驗、資金和機器。大量適齡男女勞工、特別是女工，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市場，再加上戰後西方經濟蓬勃發展，一片欣欣向榮，爲港貨提供龐大的市場出路。以出口帶動的工業開始起飛。製衣、紡織、假髮、玩具各行業逐漸發展起來，產品銷售世界多個國家，在短短十數年間，造成了現代的經濟奇蹟。1960年，本地製造的港貨佔出口總額70%。1971年，製造業本身爲香港社會提供了約五成的就業機會。

這個時期的社會是充滿機會的，一般人的生活質素逐步提高。雖然以郭伯偉爲財政司的香港政府聲言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但鑑於形勢所需，政府無可避免地積極介入了社會事務。公屋的建設，教育及醫療的服務愈趨普及，亦在這個時候開始了。1966年在全民收入分配方面，低收入的六成人口佔全民所得25.4%。到1971年，情況有顯著改觀。低收入的六成人口佔全民所得29.5%。工業起飛及接近全民就業，已讓大部份人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隨着在港出生的人口佔人口總數的比例增大，整個人口結構亦愈趨穩定。1961年，在港出生人口佔47.7%。到1966年，這個數字已跳升至53.8%。



這時文化領域強調的仍是自由，但意義却與前期的有所不同。這時強調的是擺脫物質上困境的自由，及攀登社會階梯的自由。

這時的本地政治仍非常微弱。左派最敢言，最能對政府提出尖銳的批判，但因對共產政權的恐懼，大部份人都不予理會。反而，很多民衆間的冤情都投訴到當時的民間冤情大使葉錫恩那裏去。

1966年，中國大陸展開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香港亦發生暴動。人們深深地體會到中國解放軍腳步接近帶來的威脅。人口及資金在短期間的迅速外移，經濟、物業發展急跌，人心惶惶。這一切劇烈變動，却諷刺地造就了70年代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突破性的發展。

牧民回應

教會原本在緊急情況下提供的臨時性服務，踏入60年代，已逐步有系統地組織起來。明愛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及各級教育工作都辦得愈來愈具規模，逐步成爲社會及文化生活的重要部份。這些社會事業之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起來，主要還是在財政上得到海外教會的捐贈及本地政府的資助。香港政府

對教會辦學及介入福利事業基本上是抱着支持的態度，這亦符合政府本身的不干預政策。

這時期的信仰重點仍然是愛德。只是現在的愛德工作組織得愈來愈有系統，并開始僱用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士。

社會強調擺脫貧困的自由，教會方面，亦配合這個發展，提供一張有效的梯——學校——好讓人踏上梯子，逐步攀登，跳上更高、更有地位的社會階層。為那望攀不上階梯或跌下來受傷的，教會亦藉着不同的家庭和輔導服務，甚至醫院，為他們醫治身體及心靈的創傷。

這個時期，我們教區內的各項工作主要仍依賴外籍傳教士，大部份的領導工作都由他們擔任。到1969年，徐誠斌接替了白英奇，成為香港第一任華籍主教。開始了教會本地化的步伐。

(三)着意社會發展時期（七〇年代）

七〇年代香港經濟蓬勃發展，重點在金融、地產、商業及其他號稱第三產業的服務性行業上。經過了五〇及六〇年代的艱苦努力，人們對生活質素的要求普遍提高。「歡樂今宵」不單給人放工後「嘆番吓」，更成為這個逐步踏入消費主義及享樂主義社會的口號。

麥理浩1971年11月到港接任港督。在他領導之下推出的一連串十年計劃，帶動了公屋、教育、社會福利、交通運輸、新市鎮建設等種種社會發展。他用經濟發展及售地帶來的收益、去資助種種社會建設。六〇年代後期直至八〇年代，社會服務約佔政府總開支40%，佔國民總產值10%以下。其實，與西方一些把社會服務發展至佔國

民總產值25%的西方工業國比較，香港的10%一點不算過份，只嫌過少。

到今天，我們社會已享有九年免費教育，45%的人口住在公共屋邨，公共援助計劃、基本醫療服務、分娩假期及七日有薪假期等……。表面上，七〇年代麥理浩時期採用的社會資源再分配的手段已逐步生效。理論上，貧富的差距亦應逐漸拉近。

麥理浩可能有拉近貧富差距的意向，而傳播媒介成功地把他塑造成為一個慈祥可親、關懷民間疾苦的港督。事實却并非如此。1974—5的經濟衰退把一些原訂的計劃都擱置或推遲執行。最令人憂慮的還是這十年內經濟結構出現的轉變。

不錯，第三產業的興旺發展為中產階級提供了出路，但工業發展的停滯不前却種下了隱憂。1971年，製造業僱用了47.7%的就業人口。業內產值佔全年總產值的28.1%。同年，第三產業僱用1.6%的就業人口，而提供服務却佔全年總產值的17.5%。十年後，這個比例出現了顯著的變化。1981年，製造業僱用的人口減少到41.2%，并佔國民總產24%。相反，第三產業僱用人口增加至4.7%，而產生的價值更增加至全年總產值的26%，超前於製造業。

製造業	就業人口	產 值
1971	47.7%	28.1%
1981	41.2%	24 %
第三產業	就業人口	產 值
1971	1.6%	17.5%
1981	4.7%	26 %

這種經濟結構發展下去，只會使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愈來愈惡化。加上七〇年代下半期有約50萬新移民的湧入。他們一般教育程度低，大多投入工廠及小販行列，無可避免地把工資增幅拉低。若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看，愈高的數字顯示愈大的收入差距。1971年的系數是0.43。到1981年，這個系數已高至0.45；顯示在麥理浩治下的十年間，無論他的意向如何，無論傳媒如何給他塑造一個關懷社會發展的形像，事實指出，社會資源並沒有更合理被再分配，而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幸好，七〇年代的香港經濟有大幅增長。經濟餅大了，分配不均的結構性問題便不被察覺出來。

七〇年代的在港出生人口亦比上一時期逐漸增加。到1981年，30歲以下的市民佔總人口60%，大部份土生土長。他們普遍對香港有較強歸屬感，公民意識較高。

七〇年代的政府亦給人一個效率高及開明的形像。政府更有效地吸納了大批的社會精英進入政府架構內的各層委員會中，間接提高政府權威的認受性及政府政策被市民接納的程度。「諮詢及同意」(CONSULTATION & CONSENSUS)式政治成爲這時期統治的主要形式。

另一方面，民間的冤情却有增無減。壓力團體的興起是這個時期的政治生活的特色。他們雖然一般來說人數極少，但透過傳播媒介的報導，有力地揭露了存在於社會中種種勞工、房屋、教育、社會保障等基本問題，在沉滯的社會中引進了些微對抗性的政治。

政府方面，亦從過去幾次暴動汲取了教訓。它對壓力團體已不再採用壓制的手段，而改用現代管理的技巧。港府的態度是既不



鎮壓，也不縱容，保持警惕，嚴密監視。政府的一個極具爭議的監察壓力團體小組在1979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壓力團體亦有積極的「安全活塞的作用，讓群眾的不滿情緒得以發洩。」

牧民回應

爲回應梵二的呼喚，並爲準備香港教會迎接七〇年代的挑戰，徐誠斌主教召開了教區會議。可惜，隨着徐主教的早逝，教區會議提出的種種建議遲遲未能付諸實踐。

禮儀改革、教理中心、聖神修院校外課程及教友總會開辦的各類課程的確爲教會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堂區亦開展了一些試驗，包括堂區議會及讓一些善會在堂區內扮演更活躍、更積極的角色。顯然地，這些嘗試仍不能提供足夠的思想裝備和適合現代教會需要的結構，去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即使一些接受了梵二的神學思想的教友，亦很難在現行教會結構內找到充份的空間去活出這套新的神學。

隨着政府着意擴充社會服務，教會的社會福利及教育機構亦逐步被吸納入政府的系

統內，受其資助，受其統籌，亦受其管制。一位在教會福利機構的中層工作人員曾向筆者慨嘆：「我們的機構，除了由我們管理及執行外，實在是屬於政府多，屬於教會少。」

今天，我們已有約全港三份一人口住在新市鎮裏。到1995年，約二份一人口會住在新市鎮中。教會似乎除了盡量借助在新市鎮建設學校及社會中心，并在這些樓宇中設立彌撒中心外，似乎并未考慮新的對策。這種安排在現存的政教關係範圍內，無疑是可行的。至於將來政府改變政策，或在新政府上台後，是否能繼續這樣的安排，則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教會領導層的本地化，在這時期已逐漸明顯。教區更多大任已落到本地神職的肩上。

隨着社會愈來愈組織化、專業化，識字率愈來愈高，人們一向找神職解決問題的習慣已慢慢改變。人們現在曉得到政府或志願團體的有關部門，找到個人的就業輔導，或財政及福利的支持。同時間，政府亦愈來愈訂明政策，判斷那些人資格獲取那些服務。1984年，一班修生做了一個調查，訪問了一些堂區神父。大部份被訪問的神父都感到愈來愈少人找他們寫介紹入學的信，而他們所寫介紹信的成功率亦愈來愈低。

曾經顯赫一時的聖雲仙會，到七〇年代已趨沒落。這不是因為個人或善會運作的問題，而是社會本身發展到一個程度，已再沒有這種團體提供這樣服務的需要。

這時期社會變動急劇。木屋區清拆、市區重建、及人口遷移等激發出種種社會矛盾。教會亦面對在信仰上作出新見證的要求。這時的挑戰是實踐正義，有別於前期的實踐

愛德。雖然教宗保祿六世在1968年已頒佈「民族發展通諭」，以及全球主教團會議於1971年發出了世界正義的文件，亦聲明為正義而努力是傳揚福音的構成因素，而香港正義和平委員會亦於七〇年代中期成立，但是除了少數傳教士及本地神職人員，以及少數處於教會邊緣的團體外，整體教會對實踐正義的挑戰并未作出積極的回應。很多五〇年代入教的教友，到七〇年代已晉升中產階層，教會內部並沒有向教會提出實踐正義的強烈要求。

（四）政治發展時期（八〇年代）

在一九九七問題引發之下，八〇年代堪稱為香港社會巨變的年代。最根本的變動就在政治領域上。鄧小平說五十年不變，再往後數五十年也不變。但主權一變，其他變動亦無可避免地跟着來了。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將從一個由倫敦委任的政府，變成一個由北京委任的政府。倫敦有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由民主產生的政府，北京有一個奉行社會主義及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政府。香港本身就要由一個英國殖民地轉變成為社會主義中國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如何處理這個過渡就是八〇及九〇年代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早在一九七九年，麥理浩訪問北京時，已從鄧小平口中得悉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意向。雖然，曾經以政治顧問身份隨麥理浩上京的現任港督衛奕信，在前幾天的記者招待會中，極力否認麥理浩當時已知道中國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因此，當時回港傳遞「請投資者放心」訊息的麥理浩，可說不是一些人所稱的「出賣港人的港督」，但無論如何，1981年英國國籍法的通過及代議政制的推出，着着反映出英國正在部署撤退



中英兩國間因鴉片戰爭引發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已在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中作結。我們現在面對的，就是如何建設一個在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概念下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從此，我們的命運將與中國的命運緊緊結合起來。我們將不能只向西望，而要多向北望。爲了我們自己的直接利益，我們亦要多認識有關中國的一切。

明顯地，本地政治氣候在過去數年間已趨於熱烈。區議會、市政局及立法局選舉，基本法的諮詢及草擬，再加上近日圍繞政制檢討的爭論，把香港社會提到新的政治參與層次。香港政府已徹底地感到七〇年代諮詢及吸納精英政治的不足，而要大力推行代議政制。但在中國虎視眈眈之下，政制發展已寸步維艱。

民間方面，亦突破了壓力團體圍繞個別民生事件的政治參與模式，發展出能從較有系統及整體的角度去評論政制和政策的發展，并派人參與競選各級議會席位的政治團體。

八〇年代的經濟並沒有特別使人振奮的地方。我們的口號是安定繁榮，政治上的安定，經濟上的繁榮。到現時爲止，我們的政治路途顯然崎嶇，經濟繁榮更談不上。在1971—1981十年期間，香港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在8%至10%之間，踏入八〇年代，這種數字已不常見。1982年的增長率爲2.9%，1985年只有1%。

國際保護主義抬頭，資金的外移（長實在約兩個月前嘗試發行B股，就被批評爲試圖在大量減少A股持有量的同時，仍緊緊擁有公司控制權，好讓他以低於百分之二的資金就可穩當地統治整個長實橫跨歐亞美三洲的商業帝國！更可讓他部署在九七之前將本身絕大部份資金抽離香港），近幾年包括恒隆、海外信託、嘉華、友聯等銀行倒閉風潮，再加上經濟內部結構繼續趨向第三產業的發展，加強貧富的差距。展望九〇年代，香港經濟實有很大的隱憂。

另一方面，中國的介入却爲香港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利益。無論在兩地相互投資或貿易方面，香港與中國大陸已成爲密切的經濟伙伴。

傳統在港活動的華潤、中國銀行集團，已在近年擴大參與香港的經濟事務。新公司如光大、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亦陸續在港投資發展。至於港商投資中國發展業務的亦佔了很大的比例。過去六年全部外資合計160億美元，其中六成來自港商。1985年已簽署投資大陸的合約中，85%來自香港。在近數年間，我們亦成爲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已成爲香港的第一貨品供應國，亦是排在美國之後的香港貨品最大市場，更是香港的最大轉口貨品抵達地及轉口貿易來源地。

過去，我們主要看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今後，尤其在世界經濟不景年代，我們却要多依賴中國的關係，發展我們的經濟。

在文化領域方面，我們重新面對五〇年代的問題。那時，我們是投奔英國殖民地，找尋一塊沒有共產黨統治的自由樂土。今天，我們要努力實踐一國兩制的構想，建設一個不由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中國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前面要走的路顯然是崎嶇的。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選擇：

(一)致力發展經濟。只要香港保持經濟繁榮，不搞什麼民主政治，北京就會讓香港繼續維持現狀。這是類似羅德丞的建議。

(二)努力爭取建立一個由直接選舉出來的民主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敢於為香港人向北京爭取自由及基本人權。這是近乎李柱銘的想法。

(三)移民；若果你有適合的關係、足夠的條件或足夠資金的話，到外地去尋找另一塊自由的安樂土。

牧民回應

我認為我們仍未充份了解因一九九七而起的政治過渡所包含的全部意義，主要是因為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使我們對政治無知，亦使我們完全不去注意和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

香港教會之能在過去數十年發展到今天的形式，有賴各種因素，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我們與香港政府的關係。過去直至今天的政教關係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教育福利事業的資助，及在一些推行這些事業的樓宇內設立施行聖事及牧民工作的中心。

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府將會本質上有所改變。它將不再向一個基本上認識和同情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的倫敦政府負責，而要向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對天主教會存有極大疑心的社會主義、無神主義的北京中央政府負責。天主教會過去與英國香港殖民地政府建立某種伙伴關係。但九七年後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却未必用同等態度及方式對待教會。

基於這些考慮，一些教會人士有以下的擔憂，都與維持教會現有權益有關。

(一)外籍傳教士是否被容許繼續在港居留，及是否能繼續派遣新傳教士到港服務；

(二)教會的社會事業，包括福利及教育事業是否會繼續受到政府的資助；

(三)教會在推行社會事業中加插的一些與宗教有關的活動，包括在學校課程內加入聖經課，會否受到限制；

(四)教會人士會否因可能在港出現的愛國會的問題而內部分化；

(五)一些在學校及社會服務中心內設立的彌撒中心是否能繼續運行。

我們亦可以帶着梵二的精神，用更積極的角度去看待香港教會在過渡期內的發展。胡主教曾提醒我們要肯定香港人、中國人及基督徒的身份。一九九七可以是香港教會百年來難得的一個黃金機會。前任艾巧智副主教就曾說過一九九七是一良機，之前十年是恩寵的時期。我們就要把握這良機，在未來十年突破過去建成的框框，去建設一個本地化、關懷社會、有中國人氣息的教會。

一、本地化的教會

1. 今天的香港教區，主教、兩位副主教及三位主教代表都由華人出任，但我們仍然依賴約600位外籍傳教士為我們提供各類的服務。一九九七的問題正好提醒我們加速教會本地化的步伐。盡早訓練本地神職，給他們在教區內較大的責任，建立一個具本地文化特色的教會，擺脫天主教會多年來背負的洋化的外衣。

2. 我們更要在堂區單位以下，建立一些以更小的基督徒團體為基本單位的教會，讓

大部份教友，能與神職在一起，在一個可以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的團體聚會內，感到他們就是教會，是可以分享信仰和實踐社會使命的教會。

過去十年，我們的各個團體不知在會議及訓練課程中提過基基團多少次，但香港教會到今天仍然主要是一個圍繞着聖統制為核心的教會。艾副主教就曾經指出香港教會已變得過份制度化、組織化，而這個負擔實是傳揚福音的嚴重障礙，但一九九七可以是帶給本地教會小團體發展的催化劑。

3. 未來教會團體的領導職位將主要由教友承擔。梵二開會時期主教們曾公開評擊神職主義為教會的最大敵人。若要本地教會發揮充份活力，我們要鼓勵教友接受更深入的信仰及神學培育，逐步改革教會內部結構，讓教友有機會與神職人員一起，平等地參與教會發展的決策，負起更大的責任，包括經濟上的責任，使教會盡早達到自養的目的。

4. 教友將成為主要傳揚福音的工作者。我們更要宣佈家庭、工廠、寫字樓、整個社會及政治活動範圍為傳道區。透過教友的具體生活見證，我們要把基督的訊息帶進這些區域之內。

5. 未來教會團體的靈修將不再純粹圍繞着聖事和禮儀，而更多要更具自發性的小組參與，更重視聖經。聖神將是推動團體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關懷社會

1. 面對前途問題，正當移民風氣鼎盛之時，我們的教會要有決心留下，與香港人共存亡，共同進退。教會要清晰地讓社會人士明白她不會拿走在香港社會經營積累的成果，轉移到別國發展。她會與香港人一起，甘苦與共，走未來崎嶇的道路。

2. 教會的主要盟友將不會是政府，而是人民，尤其是社會中的貧者和弱者。教會將要逐步地抽離與現行權力架構建立的關係，開始相信廣大民衆擁有的資源及能力，并與他們結盟。

3. 過去，信仰見證的表現在實踐愛德。今天，香港社會需要的是希望。鄧小平的保證，亦不足以安定人心。這時候，教會最大的挑戰就是要成為希望的見證人。教會要與香港人同行，并在路途當中不斷記憶耶穌的十字架與復活，懷抱新天新地的夢想，成為一個可信的、可觸摸到的希望的見證。

三、建立一個具中國人氣息的教會

這個將會是我們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說一國兩制，但我們都多談兩制，少談一國。我們要明白：到一九九七年，我們要回歸到一個有十億人民、具五千年文化的中國的母體。多年來，我們對這母體懷抱很大的疑懼和戒心。我們要開始從一個更積極的中國人角度去接納、面對、和欣賞這母體。

我以為在過去中國歷史中，不少天主教人士犯了兩大錯誤。第一是文化的錯誤，曾以為敬孔敬祖是迷信、拜神，而加以禁止。第二是政治上的錯誤：當外國殖民主義者藉着鴉片和武力去撬開中國大門時，我們的前人曾先後借助歐美各國在中國建立的勢力，去推動傳教工作。難怪直至今天，天主教仍被視為洋教。

在這個角度下，我們香港教會要肩負的，就是一個更大的歷史任務，去參與建設一個具中國人氣息的天主教會。

兩個月前，我和幾位修士、修女一起訪問過牛頭角下村一個教友家庭，被訪者是一位卅多歲的家庭主婦。她很樂於幫助周圍的

鄰居，包括年老的夫婦，或寡婦。我們問她對未來的看法。她給我們一個很簡單的回覆：「對一九九七，我一點都不擔心。我們窮等人家，根本身無長物，所以共產黨到來我亦不會有任何損失。到時三、四成人口外移，我們找間更寬敞的屋住將更容易。」我開始明白到聖經所說的「貧窮的人是有福的」的意義。別的人在擔心，設法移民，而她的內心却有很大的空間、很大的自由，期待一九九七的來臨，接受更大的賞賜。原因是她

一無所有。

現在，我們要做的，首先就是整頓我們的心，變成貧窮的，好製造更多的空間，聽從主的指引，接受歷史中的特恩，然後才重新檢討我們過往採用的策略，認真了解當前發生的情況，遠望將來，制定更可行、有效的策略，重新調配資源，重組新結構，建設一個富活力、進取的、充滿信心、自由的、面向未來的教會。（全文完，列表如下。）

香港社會發展

	四零年代末 五零年代初	五零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 →
經濟	生存	增長	資源分配	經濟繁榮
政治	自由放任 大陸政治的伸延		吸納精英 壓力團體	代議政制 政治團體
文化	自由 (沒共產黨、殖民地)	自由 (免除貧困)	歡樂今宵	自由 (沒共產黨、一國兩制)

教會回應

	四零-五零	五零-六零	七零	八零→
信仰	愛德	自由	正義	希望
工具	救濟	社會事業	教區及堂區組織	基基團
盟友	外國政府及教會	香港政府	中產階層	窮人
幹部	外籍傳教士		本地神職	教友領袖
靈修	守誠命 / 敬禮		禮儀	自發，依聖神引導